

中国人口问题与人口研究展望

乔晓春

—

70年代初期中国人口研究恢复以来,学术界开始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围绕中国计划生育有关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并论证了“两种生产理论”,明确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可以说,中国计划生育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与人口理论工作者辛勤劳动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人口学界主要研究的是“要不要搞计划生育”的问题,那么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人口学界主要研究的则是“怎样搞计划生育”的问题。在这期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步伐,人口研究也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思想转变,即从原来思想比较保守转变为思想更加解放,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学术上进行争鸣;另一个是方式的转变,即研究问题的方式从原来定性的、纯理论的方式转变为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理论工作者更加紧密地结合实际,从而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很多以往理论和实际研究的空白。

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特别是学者们,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在国内,一方面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的改革相继出台,导致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明显加快;另一方面,在80年代中国妇女生育率徘徊不下的情况下,90年代初的生育水平出现极为迅速的下降,一些地区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国际上,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提出了全球的“21世纪议程”,^[1]把人口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中去考虑;1994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提出,把“生育(殖)健康”

纳入计划生育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更加关注妇女地位和妇女的生殖权利问题;^[2]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不仅提出解决人口问题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同时提出要解决妇女、教育、健康、贫困和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形势的变化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新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人们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单纯就人口问题来解决人口问题是有限性的;妇女应该成为计划生育的主人,而不能单纯当作工作对象;生育率并不是越低越好;计划生育并不单纯就是为了控制人口,降低生育率等等。在这样一种新认识的指导下,中国计划生育在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先后提出:计划生育既要抓紧又要抓好;不能单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实现计划生育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加强妇女“生殖保健”服务;在部分工作基础好的地区实施“优质服务”,推行“知情选择”。在具体工作上则全面推行“三结合”,努力实现“两个转变”。

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必然要随着客观形势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和思想的大变革时期,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客观上提出很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口问题也不例外。以往的实践恰恰证明人口科学的兴旺和发展与社会需要是紧密联系的。社会发展将给中国的人口研究提出又一次发展的契机,人口研究在世纪之交将开始一次新的起飞。

从可以预见的未来看,中国将面临三大类问题:第一类是与人口结构变化有关的问题;第二类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有关的问题;第三类是与计划生育有关的问题。这三类问题在性质上不同,在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上也会有所不同。当然这些问题也是有联系的,不能截然分开。

二

中国在有效地解决过高生育率的问题以后,自然会伴随出现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在主要矛盾得到逐步缓解的过程中,以往的一些次要矛盾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中国人口的结构性问题将成为人口学界或未来人口研究的热点问题。^[3] 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1. 老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目前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并不高,65岁以上老年人只占总人口的6%。但中国老年人口群体在世界上规模是最大的,进入下个世纪中国将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而21世纪上半叶将是中国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中国未来的老龄问题不仅表现在老龄化速度快,更重要的是我国今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实力是否足以承担世界上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的庞大老年群体。老龄问题与其说是现实问题不如说是未来的问题,从现在开始老龄问题将越来越显性化,其问题的严重性是我们现在所预料不到的。这里最突出的是老年人赡养问题:由谁来赡养,怎样赡养以及赡养的力度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虽然我们相信政府会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家庭也会尽力去赡养老年人,但是一旦到了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有其愿望、无其能力的尴尬境地。

2. 独生子女问题。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迅速增加,目前北京和上海的独生子女家庭已占了一半以上,而独生子女的培养教育成为家庭和社会关注的焦点。^[4] 有研究认为,独生子女的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很高,是中国未来有希望的一代;也有人认为,对独生子女的评价不能光看智力因素,更主要的是看他(她)的非智力因素,如性格、人际关系,心理素质等。中国的独生子女与西方国家的独生子女是不一样的。它不仅是特定政策的产物,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转轨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同时也是超越传统,超越文化,超越经济的产物,从而决定了这一问题有其特殊性。

3. 出生性别比问题。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上升,并超出正常范围,到目前为止出生婴儿性别比仍在继续上升。虽然针对这一问题曾做过大量研究,但仍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搞清,以致于仍找不到一个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出生性别比偏高到底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还是

生育政策调控的结果?人为的性别选择到底有多大程度?中国真实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有多高?选择性别的社会、文化动机到底是什么等。在性别比的研究中以往过多地集中在定量研究上,特别是过于依赖国家一级的统计数据,由于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与出生统计的漏报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所以人们很难用不够准确的出生婴儿数据得出准确的出生性别比的结果。进行一些定性分析、做一些实地调查,对于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三

人口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口因素问题,它是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结合起来所表现出的问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原有旧体制所积累和掩盖的问题,在新体制下充分地显现出来,一些新的人口问题则越来越突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1. 流动人口问题。中国的“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口所在地的人户分离人口,这与理论上的流动人口概念并不一样。中国流动人口在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增加。据估计1993年达到6000万,1995年达到8000万。有人认为中国流动人口是在独特制度框架下发生的特定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过程长期滞后工业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现象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但是不同地区对流动人口的认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迁入地往往更多看到的是流动人口的“弊”,而迁出地区更多看到“利”。但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看,“利”仍然大于“弊”。但这里并不能否认流动人口存在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2. 贫困人口问题。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是相当快的,1978年时全国共有2.5亿贫困人口,到1995年减少到6500万。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预计到2000年解决所有人口的贫困问题。^[5] 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愿望。因为“贫”光靠“扶”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产生贫困的原因很多,如交通不便、干旱缺水、土地沙化、资源短缺、人口超载、人口素质低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消除贫困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研究和解决贫困人口问题仍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3. 失业人口问题。失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中国的失业人口问题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显得更为突出。据我国1996年第一季

度统计,城镇人口登记的失业率为2.07%。而实际真正的问题是隐性失业,如果考虑到还有3000万国有企业富余职工的安置问题,估计1996年城镇失业率为3.5%,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据报道,企业“双停”得不到最低工资的困难职工达到1500万人,占城镇职工的10%,其中有880多万处在贫困线以下。^[6]中国以往只承认待业,不承认失业,因此对失业问题的研究很少。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而且依据市场变化,失业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研究这一问题今后将会更有意义。

4. 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是任何社会都必须具备的一种制度。中国在计划体制下有其一整套保障办法和措施。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应该具有其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但是目前的问题是:我国正处于体制转换阶段上,旧体制解体后新体制下保障制度还未建立或完善,从而处于这一转换阶段上的人口将成为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恰恰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将给解决未来人口问题带来更多的困难。如果说我们是用计划生育解决我国以往的人口规模问题,那么未来人口结构性和伴随市场经济过程出现的人口问题将主要依靠社会保障来解决。

四

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和市场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计划生育在工作思路、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上开始出现转变。虽然这种转变只是刚刚起步,但是它的寓意是极其深远的,它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的战略性转变已经开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际工作者不应该忽视这种转变。遗憾的是多数人口理论工作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致使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显得相当薄弱。我们不愿再看到“理论落后于实践”、“人口学虚假繁荣”情景的出现。

新形势下计划生育面临的问题很多,只有在理论上做好充分的论证和研究,才能为未来的计划生育提供更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建议。这方面需要研究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对中国计划生育效果的评价。计划生育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计划生育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

目的?计划生育的结果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到底起的作用有多大?对于计划生育,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代价,那么相对于它的投入,我们又取得了多大的收益?在处于世纪之交,特别是在展望下一世纪中国计划生育的时候,这些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讨论的是过去,但它所着眼的确是未来。

2. 与市场经济体制配套的计划生育工作机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已经证明:“计划”还是“市场”只是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要坚持计划生育。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现实的计划生育工作机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在工作方式或工作方法上有相当程度的不协调,从而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计划生育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相容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证。计划生育已经提出了“两个转变”,但是如何实现“两个转变”,不仅需要实际工作者去执行,更需要理论工作者为其如何执行提供建议。

3. 加强对生育(殖)健康的研究。虽然现实中国的计划生育还不能直接用生育(殖)健康来替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在生育(殖)健康方面做工作。相反,以往计划生育过于单纯地追求控制人口数量,在生殖保健服务方面做得还不够。加强生育(殖)健康领域的服务,进一步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的生育(殖)健康,是今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人口问题,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7]那么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妇女、对妇女生育(殖)健康的关注,则是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研究妇女在生育(殖)健康方面的愿望和需求,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将成为学者们在计划生育研究方面的重要课题。

4. 加强对城市计划生育的研究。以控制人口增长为核心的计划生育,长期以来一直把工作重点放在人口多、生育率高的农村地区。近年来由于城市,特别是企业改革的加速,城市中出現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表现在流动人口和失业、下岗职工大量增加。这些给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和压力。事实上,作为二元结构的社会经济体制,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差异很大,原有比较成熟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办法在城市并不适用;而城市在体制上又比农村复杂得多,特别是人员构成、人员所属的地域、所属企业和部门的类型更为复杂,从而给解决问

